



采挹流霞

乾隆皇帝收藏的成化官窯器

■ 余佩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二萬三千多件清宮傳世瓷器，從皇室擁有角度看，琳瑯滿目的項類應是累積歷代帝王珍藏的成果。儘管這些作品件件隨附文物典藏號，多數可以透過編號逐一回推出每一件文物在 1920 年代，紫禁城轉型成為故宮博物院前的貯藏宮殿。但是像本文論述之「采挹流霞」箱——一種將類似瓷品匯聚成組加以典藏的狀況較為少見。本文以「采挹流霞」箱為題的研究，同時涉及兩個面向，一是乾隆皇帝的收藏，二是成化官窯器。關於前者，誠如日前「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探討得出的觀點般，乾隆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狀況，因為存在皇帝著手整理的過程，故可從他發旨重新包裝中，發現一分屬於帝王鑑識的痕跡以及輾轉再造的品牌。其次，所謂成化官窯器，顧名思義即為明成化朝燒造的官窯瓷器而言，其燒造狀況，一如史書所載，具有「燒造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的評語（《明史·食貨志》），然而成化朝（1465-1487）歷時僅 23 年，完全稱不上「最多且久」。或因如此，為解開成化朝燒瓷之謎，學界莫不投入相當關注，無論是針對出土材料和傳世器的對比，¹ 器表裝飾紋樣、器底款識，² 個別作品的樣式與技法，³ 承造因素⁴ 和後仿成化款作品顯示出來世人對成化官窯的想像；⁵ 甚至因為最近空白期（明正統、景泰、天順三朝〔1436-1464〕）瓷器大量發表後，又提醒我們論述成化官窯瓷器無可避免地也需要考慮到空白期作品的觀點等，不一而足。有別於前述學界已然存在的研究現況，本文將從乾隆皇帝收藏的角度著眼，重建一箱成化官窯器的流傳經過，以及與之相關的文物鑑賞變遷。

成化官窯箱的名稱及流傳經過

筆者某日翻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下簡稱《活計檔》），無意中發現乾隆十五年（1750）〈匣作〉下存在一筆紀錄：

「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黑漆描金空箱一對、黑漆描金箱一件（內盛水晶杯二屨，上層十件，內二件足缺、口毛。下層十件，內二件足缺、口毛）、黑漆描金箱一件（內盛三層）」，特別是最後登錄之「黑漆描金箱」，其內裝三層文物，亦非常難得的逐層列出如下：

第一層—成窯五彩雞缸杯八件、成窯蝴蝶酒元八件（內一件口毛、一件有璽）、成窯五彩平足杯八件（內一件驚璽、一件火霞、兩件釉水不全）。第二層—成窯人物酒元二件（一件缺釉、一件有滑）、成窯五彩菓子酒元六件（兩件口毛、四件缺釉）、成窯青夔龍平足酒元四件（二件缺釉、一件滑）、成窯五彩平足酒元四件（二件滑、一件缺釉、一件有火霞）、成窯青番字酒元二件（俱缺釉）、成窯五彩如意雲酒元六件（一件缺釉、二件釉水不全）。第三層—成窯五彩四季花茶元二件（內一件缺釉）、填白酒元二件、成窯填白暗龍酒元四件（內二件缺釉）、成窯五彩夔龍酒元二件（具缺釉）、成窯青番字酒元二件、成窯五彩葡萄酒元二件、成窯五彩娃娃酒元二件、成窯葡萄酒元二件、成窯青花酒元四件（內一件口毛、一件缺釉）、成窯填白暗龍酒元二件、成窯番花酒元二件（內一件缺釉）。傳旨：將水晶、成窯杯等，著在黑漆描金空箱內盛裝。欽此。⁶

由於出現在裝箱清單中的「五彩雞缸杯」、「蝴蝶酒元」、「青番字杯」和「五彩葡萄酒元」不僅得以和傳世品互為對照（圖1～4），同時該一箱匣亦令人聯想到院藏一箱貯藏著成化官窯器的漆器箱（圖5）；⁷因此，為了清楚確認檔案紀錄和傳世品的關聯，以下將以檔案內容為據，逐層確認目前猶與原包裝共存的瓷器項類及件數。同時為免造成混淆，凡能與檔案對照之瓷器，以下論述皆採用檔案紀錄之品名。



圖1 「成窯 五彩雞缸杯」（《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成窯 蝴蝶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成窯 青番字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成窯 五彩葡萄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成化官窯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一層文物有三類。樣式和件數分別為「五彩雞缸杯」八件（見圖1）、「蝴蝶酒元」八件（見圖2）和「五彩平足杯」八件。（圖6）經核對現存物後，發現其中兩類瓷器皆和檔案紀錄一樣；惟獨「蝴蝶酒元」目前僅見六件，但當我們檢視原存放匣盒時，可在空位中發現遺留其中的兩張黃籤（圖7），其中一張清楚寫出「宣統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賞醇親王福晉用」，另一張則為「宣統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賞醇親王福晉用」。由此可知，兩件「蝴蝶酒元」分別

在1919年和1920年，由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提出賞給他的母親。⁸

第二層文物有六類。無論「人物酒元」（圖8）、「五彩菓子酒元」（圖9）、「青夔龍平足酒元」（圖10）、「五彩平足酒元」（圖11）、「青番字酒元」（見圖3）和「五彩如意雲酒元」（圖12）等，目前所見作品樣式和數量，悉數與檔案記載吻合。

第三層文物共計十一類。其中「五彩四季花茶元」（圖13）、「填白酒元」（圖14）、「填白暗龍酒元」（圖15）、「青番字酒元」（圖16）、「青花酒元」（圖17）、「填白暗龍酒元」（圖18）和「番花酒元」（圖19）等七類瓷器的樣式，儘管存在「填白暗龍酒元」（見圖15、18）係屬同一類瓷器，但分匣貯裝的狀況，不過細校該些作品的品類與件數，可確認完全符合檔案所記。至於不同的情形，首先，檔案清單登載之「成窯五彩娃娃酒元二件」，應為後人熟悉的嬰戲杯，這類作品並不見於成化官窯箱內（圖20）。而應為同一類作品的「成窯五彩葡萄酒元二件」和「成窯葡萄酒元二件」（見圖4），



圖6 「成窯 五彩平足杯」(《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成窯 五彩人物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成窯 蝴蝶酒元」及其盛裝匣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成窯 五彩菓子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成窯 青夔龍平足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成窯 五彩平足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成窯 五彩如意雲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成窯 五彩四季花茶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填白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成窯 填白暗龍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成窯 青番字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成窯 青花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成窯 填白暗龍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成窯 番花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成窯 五彩娃娃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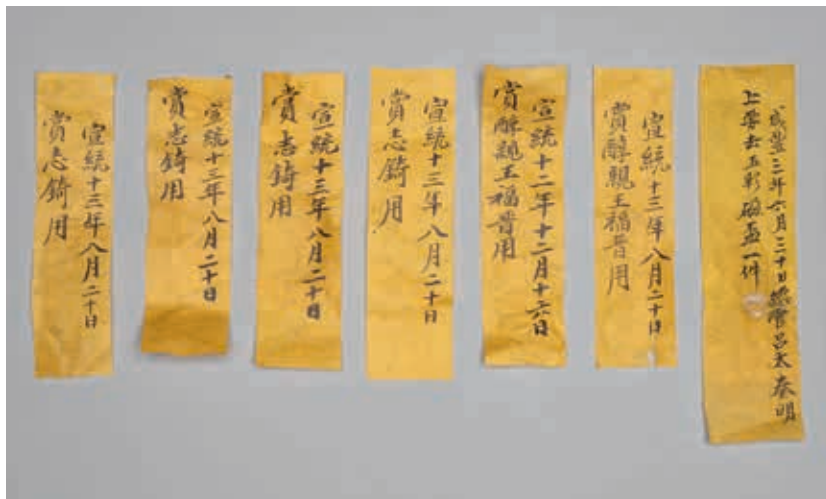


圖21 成化官窯箱內留存的取物黃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成窯 五彩夔龍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底款

目前則僅見兩件留存箱內。據此對照原箱包裝，而可發現其中存在兩個空匣，如果文物是兩兩放在一個錦匣，那麼兩個空匣應為目前不見的四件瓷器的儲存盒。同樣地，打開這兩個木匣，可發現遺留其中的四張黃籤，從四張黃籤均標注

出同樣的內容：「宣統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賞志錡用」，而得知目前不見的四件瓷器，已於1920年提出，賜給志錡去了。（圖21）

其次，盛裝「五彩夔龍酒元」的木匣亦為兩件共貯的設計（圖22、23），但目前僅見一件，



圖23 「成窯 五彩夔龍酒元」及其盛裝匣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空缺處同樣可見一張黃籤，籤上「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總館呂太奏明：上要去五彩磁盃一件」（見圖 21），說明短少的一件，竟是整個收貯箱中最早（1853）被取走的瓷器。經過前述檢視，得知目前所見成化官窯箱共收貯六十七件文物，和檔案登錄「黑漆描金箱」三層共計七十四件的狀況有所不同。儘管如此，對照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紫禁城各個宮殿登錄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以下簡稱《點查報告》），則發現 1920 年代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時，整個成化官窯箱存放於景仁宮，內裝物如同《點查報告》所載，確實是六十七件外加兩個空盒。

但是，如果想要更精準地嫁接《活計檔》與傳世實物的關連，那麼仍有必要回到檔案與目前所見狀況進行其他面向的核對。首先是乾

隆十六年（1751）〈匣作〉下也出現一則紀錄：「初三日首領白玉鳳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采挹流霞洋漆箱一件（計二十五匣內盛成窯五彩酒盃七十四件，未交出）……」，最後由皇帝裁示：「傳旨：將此箱內匣子有蟲蛀的，俱換楠木胎，仍糊舊錦瓔舊邊，其未蟲蛀的，不必換。欽此」⁹，而瞭解當初各個箱匣被提出檢視蟲蛀，以進行後續文保工作的狀況。這則資料應用於本文題旨，則是清宮管事人員持續記錄一個內裝七十四件「成窯五彩酒盃」的洋漆箱。據此，還能往前再連結到乾隆六年（1741）〈牙作〉下的一筆紀錄，了解整組組合的名稱及其於乾隆朝出現的時間點。亦即藉由「二十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旨：將乾清宮墨妙珠林畫箱等九件，著按箱名色做象牙簽子，刻

字。欽此」的說明，可從逐一表列而出的箱匣清單包含一筆「采挹流霞係成窯青花、素白、五彩酒鍾一箱」¹⁰，一方面回應整組包裝最初還隨附一個象牙吊牌，另一方面，因此則紀錄述及箱內收貯有「青花、素白、五彩」三類文物，完全能夠呼應前述乾隆十五年的組裝清單和乾隆十六年的組合件數，從中不僅得以追溯出成化官窯箱整組組合擁有一個「采挹流霞」的名字，還能見證到乾隆六年為之配製象牙名牌的經過。

藏物樣式及鑑賞變遷

現存成化官窯箱中的六十七件瓷器，如前所述，包含青花、鬥彩和白瓷三個項類。若再進一步將同類花紋與器形視為一種樣式，又可從中歸納出十六個各自不同的類型，而且無論「雞缸杯」、「蝴蝶酒元」、「五彩人物杯」、「青夔龍平足酒元」、「五彩平足酒元」、「青番字酒元」、「五彩如意雲酒元」、「五彩四季茶元」、「填白暗龍酒元」和「五彩葡萄杯」等均能和1993年、2017年，先後公布的出土例相互對照。但因篇幅有限，在此僅擇例說明如下：如其中甚受矚目，有「三秋杯」之稱的「蝴蝶酒元」（見圖2），其器形雖然和景德鎮窯

址出土的敞口碗有所不同（圖24），然而若仔細比對兩者共同具備的黃彩蝴蝶採蜜紋樣（圖25），而能明白官樣圖案跨器形裝飾之面向。同樣地，見於「蝴蝶酒元」器表之花、蝶組合，亦近似於窯址出土之「淡描青花折枝花果花蝶圖蓋盒」蓋面以鈷藍釉勾繪完成的花蝶紋。（圖26）也因有此追溯，而讓筆者發現傳世另一組帶「乾隆御玩」款木座之花蝶杯（圖27），儘管該類作品底書「大明成化年製」款識，但相較之下，該款識較為規整，與一般公認帶一點稚拙風格的成化官款不同，同時該兩件作品在紋樣布局上，因留白增多，反而讓花與蝶缺乏彼此呼應的關連等，均讓兩件作品反映出係為後仿的可能性。

此外，成化官窯箱中亦存在無款猶待識別年代之「填白酒元二件」（見圖14），該兩件作品從底足可研判亦出產自景德鎮，但風格和帶暗龍紋裝飾的細薄白瓷杯略為不同。相對於此，箱中六件帶款裝飾暗龍紋的細薄白瓷杯，則不僅能呼應窯址出土之成堆細薄瓷片（圖28），也能追溯出是繼承永樂甜白暗龍紋碗以來的絕妙技法。再者，目前箱內僅存的一件「五彩夔龍紋酒元」（見圖22），若將之同時對照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圖29）和傳世另一件沒



圖24 明 成化 鬥彩花草蝶紋杯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明代成化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下冊，頁403。



圖25 「成窯 蝴蝶酒元」（《活計檔》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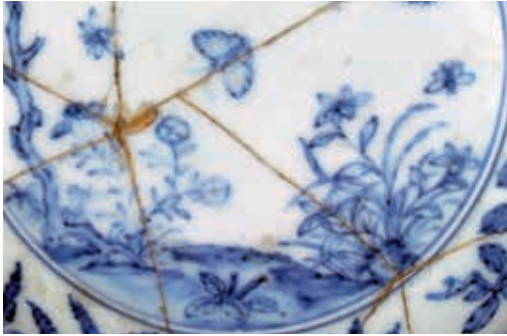


圖26 明 成化 淡描青花折枝花果花蝶圖蓋盒(局部)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明代成化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上冊，頁340。



圖28 景德鎮窯址出土細瓷片 取自劉新國，《成窯遺珍——景德鎮珠山出土成化官窯瓷器》，頁66。



圖27 清 半脫胎青花鬥彩花蝶杯 木座、底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清 康熙 鬥彩夔龍紋杯 取自馮先銘、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頁105。



圖3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夔龍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疑義的「鬥彩夔龍紋杯」(圖30)，可發現該品外壁的四個團夔龍與間飾其間的纏枝朵花，雖然是成化官窯的典型裝飾元素，但由於夔龍紋造型較為細瘦，以及該品在紋樣布局和款識

標記的書風上，其實更相似北京故宮帶「大清康熙年製」款作例(見圖29)，進而得以比對出「五彩夔龍酒元」亦為康熙朝仿品。

至於文物流傳過程所出現的鑑賞變遷現象，

則能通過與雞缸杯相關的文獻來理解。亦即當我們從《萬曆野獲編》理解明朝有所謂的廟會活動，通過清人重編轉述的線索，想像來到明朝的城隍廟前，穿過人聲鼎沸、熙攘往來的人群終於找到一間古董店鋪，進去以後的陳列景象，猶如文獻記載：「……其他剔紅、填漆舊物自內廷闈出者，尤為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其價十倍矣。至於窯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蓋之屬，初不過數金，余兒時尚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窯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予為吐舌不能下。……」（卷34，〈廟市日期〉），而間接能感受到成窯杯蓋隨著時間邁進，身價亦一路水漲船高的演變。特別是將此筆資料對比明人高濂《遵生八牋》中（1591）有關：「……成窯上品無過五彩葡萄，敞口扁肚靶杯，式較宣杯妙甚，次若草蟲可口、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盞、五供養淺盞、……余意青花成窯不及宣窯，五彩宣廟不如憲廟，……」的敘述（卷14），而可以一窺十六世紀晚期藏家眼中的宣德和成化兩朝瓷器各有專擅品類，即使單就成化瓷器而言，葡萄紋高足杯其實遠勝過雞缸杯（圖

31），擁有「成窯上品」的美譽。然而，一旦將時間切換到明末，如同《帝京景物略》（1635）作者所言：「……成杯茶貴於酒，彩貴於青。其最者，鬥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廟、光宗，尚前窯器，成窯一雙，值十萬錢矣。成、宣靶杯，俱非所貴」（卷8）。雞缸杯於該時已經搖身躍過葡萄杯，不斐的價值讓它成為成化官窯的代表作。

此點至清初，依然未曾改變。在康熙皇帝的寵臣——高士奇（1644-1703）筆下，〈成窯雞缸歌〉一方面固然娓娓細數成化官窯酒盞的種類，舉凡葡萄紋、嬰戲紋和高士紋者都是藏家競逐的標的物，然而藉由紋樣的解讀：「什襲真堪琬琰比，尤其著者推雞缸。陸離寶色搖晴牕，鼠姑灼灼老雞喚。將雛抱穀三兩雙，梅村老翁稱解事」（《高江村集》，卷7），說明高士奇眼中仍視雞缸杯為箇中翹楚。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當乾隆皇帝再作〈成窯雞缸歌〉亦抱持相同的觀點。儘管在他發旨景德鎮御窯廠仿燒時，出其不意地加入了《東城父老傳》中的唐代鬥雞神童賈昌的故事（圖32，乾隆官



圖31 明 成化 鬥彩葡萄高足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2 清 乾隆 粉彩雞缸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窯仿燒雞缸杯至少存在兩種樣式，此為其一），但是流露於詩文「宋明去此弗甚遙，宣成雅具時猶見。寒芒秀采總稱珍，就中雞缸最為冠」的文字（《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34），不由分說地表達出：在經常可見的宣德和成化兩朝官窯器中，他同意將雞缸杯列為最優品級。

從務實的角度看，乾隆皇帝鑑賞雞缸杯的想法，除了與他收藏成化官窯器密切相關外，若梳理雍正朝的面向，或也能從中理解有一部分是來自雍正朝的影響。其一是關於造作部分，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曾針對郎中保德、員外郎海望交出的「成窯五彩罐一件」，降旨：「嗣後燒法瑯並磁器，俱照五彩罐上花樣畫」。至雍正七年（1729），仍因一件「成窯五彩磁罐」無蓋，皇帝降旨「將此罐，交年希堯添一蓋，照此樣燒造幾件，原樣花紋不甚好，可說與年希堯往精細裡改畫」，除了配蓋外，也修改原樣圖案進行新品仿燒，¹¹因此才有將傳世雍、乾兩朝畫琺瑯白地花蝶紋蓋罐一類作品（圖33），看成是與此一脈絡相關的產物。（另亦有將北京故宮藏成化鬥彩罐一併列入清仿品之觀點）其二是關於收藏面向，自雍正元年（1723）開始，《活計檔》記事即登錄多筆與成化官窯器收貯相關的紀錄。如雍正元〈匠作〉項下，已經存在怡親王發旨為「成窯青花白地番字杯一對」和「成窯蝴蝶杯四件」配做「合牌錦匣」。¹²由於這幾件作品正是與本文題旨相關的樣式，遂不免令人好奇，難道目前所見成化官窯箱的組成也可推至雍正朝？

組合時間與原裝問題

這個議題牽涉到目前所見成化官窯箱究竟成組於何時，是否為原裝箱？依照前述《活計檔》記事爬梳，得以了解目前所見到的組合，



圖33 清 雍正 銅胎畫琺瑯白地花蝶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下限至遲可以上推至乾隆十五年，然而乾隆十六年又出現的「計二十五匣，內盛成窯五彩酒盃七十四件」的描述，同樣提供我們進一步檢視此一包裝即否為原箱的線索，亦即檔案記錄「采挹流霞」箱原裝七十四件成化官窯器，但目前所見短少七件的現象，經過前述七張取物黃籤的梳理，而可以理解目前僅見六十七件的原因。（見圖21）那麼接下來的裝匣狀況，首先就目前所見箱內盛裝瓷器的匣盒而言，從其數量和大小不同的尺寸可將之區分成四種樣式（見圖7、圖34～36），即使再加上兩個原空木匣，全部加總也只有十九個，其數量明顯和檔案記載有別，更遑論存在三層的設備。所以，針對乾隆朝的狀況，可以歸結出兩個面向，一是組成的內容，除了被提走的瓷器，被置換過清仿成化五彩夔龍紋杯之外，兩件無款白瓷杯和兩件「五彩四季花茶元」因均見於原始清單，故透露出組成內容自乾隆朝以來，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二是裝箱匣數和檔案記錄的不同，讓人懷疑目前所見成化官窯箱或不見得是原包裝的可能性。



圖34 明 成化窯 鬥彩團花鳥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5 明 成化窯 鬥彩高士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6 明 成化窯 鬥彩雞缸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此，若跳開乾隆朝，往前再追查檔案記載，其實可以從雍正朝的檔案記事中比對出更早的組合時間和包裝出現改變的狀況。亦即若將乾隆朝《活計檔》所載的內容對照雍正七年（1729）〈漆作〉下的一筆資料：

二十五日太監劉希文、王太平交來銅鍍金包鑲事件，畫太極圖洋漆箱二件，內一件盛成窯茶圓六十二件、內一件盛成窯酒圓七十四件。傳旨：著合配鑲櫻竹邊錦匣盛，再洋漆箱內上層要一般平，隨其器皿大小集錦式安放。器皿內有成對者，不必拆開，一匣內盛裝。若箱內仍有餘空，隨其器皿做黑漆架。如何安提手處，酌量配安，欽此。（于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做完，司庫常保、首領薩木哈呈進訖）¹³

而可比對出雍正朝檔案中的兩組洋漆箱內裝物的器用別和件數，因均能與乾隆十六年洋漆箱清單中所見「采挹流霞洋漆箱一件（計二十五匣，內盛成窯五彩酒盃七十四件。未交出）、綠雪涵清洋漆箱一件（計三十一匣，內盛成窯茶鍾六十二件。未交出）」（最後都已交出）互為呼應，加上另一個「綠雪涵清洋漆箱」的藏物內容，又能夠再往前追出正是雍正七年〈匣作〉下逐一條列而出的組合，從中不僅得以重建該箱匣是一組包含「成窯五彩鸚鵡摘桃高足圓十件」和「成窯五彩葡萄高足圓八件」在內的組合，¹⁴也說明雍正朝組合文物傳承至乾隆朝的情形。最重要的是這筆記錄能反過來了解兩組洋漆箱至遲於雍正十二年（1734）均已組合完成。是以本文關注的「采挹流霞」箱，其最早組成的時間點是雍正十二年，而且如同檔案所見，後



圖37 清 康熙 青花瓷盤 法蘭克福應用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 Gunhild Avitabile et al., *Chinesisches Porzellan: aus Beständen des Museums für Kunsthandwerk Frankfurt am Main*, 65.



圖39 桔梗折墨桐紋蒔繪飯器 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Japan蒔繪—宮殿を飾る 東洋の燦めぎ—》，頁77。



圖38 成化官窯箱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0 桃山時代 HIS 葡萄蒔繪螺鈿聖餅箱 東慶寺藏 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覽會《蒔繪—漆黒と黄金の日本美—》，頁106。

來於乾隆六年、十五年、十六年均再提出整理。

再就存放成化官窯器的外箱來看，雍正朝檔案將之描述為「銅鍍金包鑲事件，畫太極圖洋漆箱」，乾隆朝則泛稱「黑漆描金箱」或「洋漆箱」，無論何者，均可理解是指日本蒔繪箱而言，而且兩相對照下，所謂「事件」，應可

對照雍正元年檔案，了解是指佰事件，即匯聚各類物件，使之成組的一類藏物組合而言。而銅鍍金應指箱匣邊角、盒蓋提把和蓋、身關合處鎖頭的金屬裝備，至於「太極圖」，從康熙朝瓷器畫有觀太極紋樣（圖37），¹⁵而能合理推測檔案中的「太極」圖案，應雷同於瓷器上

所見紋樣。目前成化官窯箱外繪轉枝花葉紋（圖 38），則顯示出此箱匣當非檔案所錄之原箱。在此之下，或可通過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及神奈川東慶寺同樣裝飾葉紋的蒔繪漆器（圖 39、40），首先對比出成化官窯箱之紋樣係屬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高台寺平蒔繪風格，¹⁶ 其次因此紋樣無論如何無法回應檔案形容的「太極圖」，故而出現兩個可能性，一因乾隆朝記錄沒有特別針對外箱進行說明，而表示從雍正朝傳遞至乾隆朝時，有可能仍維持同一包裝。二是外箱已經更換。無論哪一種，因今日所見箱匣無論裝飾紋樣和內裝匣數均和雍、乾兩朝的紀錄不同，明顯地流露出非檔案提及的原包裝。但若又考慮到乾隆皇帝經常來來回回重組各式各樣箱匣，甚至對其內裝物進行調整、再組合的面向，其實也不排除現今所見成化官窯箱亦成組於乾隆朝。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江西省景德鎮窯址考古出土材料，見劉新園，〈明景德鎮出土明成化官窯遺跡與遺物之研究〉，《成窯遺珍——景德鎮珠山出土成化官窯瓷器》（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頁 18-88；及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成化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
2. 天字蓋罐及成化官款和明朝館閣體的關聯，見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及其有關問題〉，《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 215-237。
3. 天字罐問題見 Julian Thompson, "Chenghua Porcelain,"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1 (2007): 53-57.
4. 精巧瓷品出現的脈絡，見戴維德夫人，〈成化瓷器〉，《故宮季刊》2 卷 2 期（1967 秋），頁 1-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特色，見董依華，《明成化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蔡和璧，《成化瓷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蔡和璧，《傳世成化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3）；蔡和璧，《故宮成化瓷器精選》（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特色與成化官窯承造綜述，見呂成龍，〈明成化御窯瓷器簡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 4 期，頁 26-36。
5. 劉靜，〈成化官窯的形塑——從檔案探析乾隆朝民間對成化官窯的認識〉，《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 4 期，頁 37-50。
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7，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匣作〉，頁 566-567。
7. 本文論述之成化官窯箱，首發於蔡和璧，《成化瓷器特展圖錄》，後來在《故宮成化瓷器精選》中亦有相關描述，見頁 284。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透過造辦處檔案載錄的內容，追溯出成化官窯箱的組合時間和名稱。
8. 參見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二冊（臺北：國史館，1986），頁 1021-1022。及《清史稿校註》第十冊（臺北：國史館，1986），頁 7683。
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匣作〉，頁 158-159。
1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牙作〉，頁 71-72。
11. 前筆資料出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三年正月十九日〈法瑯作〉，頁 667。後筆資料出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雍正七年五月十三日〈法瑯作·大器作〉，頁 97。
1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匣作〉，頁 192。
1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漆作〉，頁 762。
1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雍正七年五月十四日〈匣作〉，頁 137。
15. 圖文見 Gunhild Avitabile et al., *Chinesisches Porzellan: aus Beständen des Museums für Kunsthandwerk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Museum für Kunsthandwerk, 1992) p.65.
16. 本文用以比對的「桔梗折墨桐紋蒔繪飯器」，據說原為豐臣秀吉（1537-1598）家臣尾藤知宣所有，但 1587 年尾藤知宣戰術失利後，該品遂與其領地歸為加藤清正所有。尾藤知宣藏品圖案近似豐臣家家紋，而本文論述之成化官窯外箱裝飾之葉紋，則類似另一位大名松永家族之家紋，但詳情為何尚待研究。「桔梗折墨桐紋蒔繪飯器」之說明見京都國立博物館編，《Japan 蒔繪—宮殿を飾る 東洋の燦めき—》（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8），頁 246、298。另外，以歐洲市場為導向的「南蠻漆器」中也有以葡萄紋為飾者，見京都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覽會《蒔繪—漆黒と黄金の日本美—》（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5），頁 106、192。